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

华 立

说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人口现象，人们几乎无一例外会首先想到这个时期的人口膨胀以及它所带来的人口重负和种种社会矛盾的加剧，这当然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但是除此之外，十八世纪的人口现象，还有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即这一时期形成的全国人口流动的新格局。它与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对边疆开发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无论从社会史的角度，抑或边疆开发史的角度，十八世纪的人口流动，都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人口流动是人口在一定地理空间的聚集、扩散与变动，历代皆有，但流动形式及规模，却每有不同。魏晋以前，人口的流动多以黄河中下游人口稠密区为中心，向四边作“离心状”的扩散；魏晋迄宋，随着北方草原民族不断向汉族居住的黄河流域迁移，迫使汉民族人口大举南迁，又出现了自北而南的大规模流动趋势。有些朝代如明，以中央集权的专制力量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以保证国家税收，致使人口的迁徙流动困难重重。当历史步入人称“康乾盛世”的十八世纪，清代社会的人口流动呈现出与前述各代迥异的新格局，其突出特点是：一、人口流动的普遍化，成为全国性、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二、内地人口多方位、多形式地流向边疆地区，成为人口流动大潮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趋向，其数量规模之大、分布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均非以往任一时代所能比拟。

十八世纪人口流动新格局的出现，与十八世纪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换言之，它是同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影响人口流动的诸多因素中，有两项因素最为关键，那就是同时期中国人口（主要是内地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同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发展。我们知道，乾隆六年(1741)的人口数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人口统计数字，据此次调查统计，全国在册人数为 14,341 万余口，首次突破一亿大关。此后，中国的人口数字持续上升，乾隆二十七年(1762)时超过二亿，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则进而突破了三亿数额，达 31,320 万(1)。这说明，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中国至少净增人口 17,000 万，平均每年增长 320 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一般说来，人口增长是国家安定、经济上升的社会表现，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大大超过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幅度，就会给社会造成沉重压力，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事实上，人口膨胀，“生齿日繁”在康熙中叶已见端倪，而后日益显著，导致人浮于地，米价腾贵，民生困难。由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人口压力比较突出地集中在内地省份，形成相对于边疆地区的人口“高压区”。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出现和不断增加，便是促使十八世纪清代内地人口持续向外流动的内在动因。

在内地人口压力加剧的同时，清代的广大边疆地区则日益具备了适宜人口移居的各种条件。从政治上看，经过康、雍、乾三朝半个多世纪的大力经营，终于在十八世纪中叶奠定空前的大一统疆域版图，东起库页岛、台湾，西迄巴尔喀什湖、葱岭，西南沿喜马拉雅山直到云南高黎贡山和恩梅开江，都在清朝政府有效管辖之下，彻底改变了边疆与内地及边疆各地之间的阻隔状态，形成前所未有的整体联系；从经济上看，边疆土地广阔，人口稀疏，资源丰富而有待利用，具有谋生的优裕条件，对人口流入有很大的吸引力。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曾说：“古

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檐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污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2)他的话，道出了十八世纪人口流动的时代特点。

内地人口迁移边疆，并非易事，受到地理位置、经济结构、社会环境、民族差异、政府对策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在大规模流向边疆的总趋势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又呈现不同态势，使人口流动具有多样性，整个进程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就流向而论，虽然都从人口稠密地区移向人口稀疏的边疆，却不表现为单一中心的向外扩散，而是多方位的运动。要而言之，可以区分为北方、南方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体系，每一体系又包括若干迁出——迁入的区域性组合。

北方区以中原数省为迁出源地，分别向东北、北方口外及西北新疆流动，大致有如下三种迁移组合：

1. 直鲁两省→东北三省。山东、直隶均为全国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山东尤居中原各省之首，人口向外流动最多。清政府顺治年间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旋即停止，宣布实行封禁，以维护旗人对关外耕地及特产的垄断，保护"发祥重地"。但是由于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距两省道里亦近，陆路经由山海关、喜峰口等处，海路乘船至辽东半岛，顺风扬帆，一日可至，故自发移民趋之若骛，势不可挡，以致禁而不绝，愈查愈多。在以经济需求为原动力的自发流迁浪潮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向后退让，对流民网开一面，对迁移的既成事实予以承认。

2. 直鲁晋陕→口外蒙古地区。四省流民到口外谋生，也首推山东人，其次是直隶、山西两省。流民进入蒙古地区，分东西两路，一路于闯关东后由东北向西辗转进入内蒙古东部，一路则出古北口、杀虎口(人称"走西口")进入察哈尔、热河、归绥土默特等地。清政府认为贫民出口谋生在情理之中，又担心蒙汉杂处，不易统治，故态度矛盾，政策亦时紧时松，总的趋向是有限制地开放。

3. 陕甘两省→新疆。在十八世纪，新疆是唯一由政府出面倡导并组织人口迁移的边疆地区，出于对西陲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和"以边养边"的实际需要，不惜投入巨资，搬移内地军民、遣犯进疆屯垦开发。由于新疆与内地有高山戈壁阻隔，道路遥远，自然条件亦远不及东北和长城口外，所以农业移民主要来自距离最近的陕甘两省，以农耕条件较差的甘肃贫民为最踊跃，并逐渐从有组织迁移过渡到自动流迁，形成源源西来的热潮。

南方区没有北方那样明显和比较稳定的人口迁出中心，人口流动更加多极和多样化。除经济发达的江南城镇和相邻省份的山区地带可接纳一定数量的过剩人口，远距离的人口流迁有如下几种情况：

1. 从东南和中南省份流向西南。清初曾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四川并非边疆，只是因为遭受战乱破坏过重，导致人口锐减，极度萧条。这一运动在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渐告停止，代之而起的是湘鄂赣粤诸省及四川人口大量流向云贵地区，尤以云南的采矿业吸引人口最多。所谓"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3)，写出了流民汇聚的盛况。广西在改土归流后也接纳了大批广东客民在此经商或垦荒种地。稍后又出现了外来人口在云贵川几省间穿梭流动的情况。官府对自发流向西南的大批人口原则上予以认可，力求借助州县保甲等基层政权严加控制，防"患"于未然。

2. 从闽粤两省流向台湾和海外。广东、福建依山傍海，均为人口稠密、山多田少的省份，与台湾隔海相望，发展潜力不在陆地而在海疆。从交通条件看，闽粤渡海赴台及南洋诸岛，要比内地陆路交通更为便捷。随着“食指日繁”，两省人口除一部分流向川桂滇黔，更以相当规模涌向台湾和海外。赴台移民中，福建人最多，十居六七，又以漳泉二府为主，其次为广东东部的潮州、惠州二府。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之前，清政府以渡台谋生为非法，严行盘查，但偷渡者冒死以赴，络绎不绝。后禁令渐宽，至十八世纪末，乾隆帝决定开放鹿耳门至厦门等处官渡，迁台人数遂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十八世纪以降中国流动人口大量涌向边疆，对于边疆开发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类是开发活动的主体，在开发建设中起能动、主导的作用，对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广大边疆地区来说，保证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和具备相当的素质，具有足够数量和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更是当地得到开发的基本前提。据有关研究分析，从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至少有不少于一千万的内地人口迁往边疆各地，除新疆移民数量较少，其余差不多都超过百万之数，台湾不会低于 120 万，流民集中的东北则可能高达 200 万之众。(4)如果考虑到事实上还有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由于时来时去，往返不定而未能编入户口统计，则人口流入的规模应更加可观。这些流动人口的共同特征是：年力精壮、富于生产技能者居多，又来自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内地，故他们的到来不仅填补了边疆地区人口数量的空白，也有力地改善了劳动力的素质结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最终融入边疆社会，成为本地居民的有机组成部分，某些地区如东北、台湾，外来移民甚至取代土著居民成为边疆人口的主要成份和开发的主体力量。

外来移民作为极有活力、能动的人口群体，在边疆从事丰富多样的经济活动，与土著人口共事开发，或务农，或经商，或采冶，或从事手工业，大大加快了边疆经济的发展速度。由于封建时代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制约，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在边疆致力农业开垦，胼手胝足的辛勤劳作，加之引进内地的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使得边疆农业突飞猛进，不仅东北和台湾从此奠定农业经济基础，口外蒙古的长城沿边一线和新疆天山以北也前所未有地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区，经济格局第一次从延续了上千年的完全游牧经济过渡到农牧相兼或以农业为主，这无疑是重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变革。奔走于边疆各地的各类商贾，是沟通边疆与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媒介，同时为边疆商品经济注入活跃因素。无论出身山西的旅蒙商，寓居新疆南八城的陕甘商人，还是云南、广西一带的贸易客民，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上述作用。商贾还为边疆带来加快开发所必需的宝贵资金，以云南为例，矿业能在十八世纪中叶蓬勃兴起，除了劳动人手的大量涌入外，还和“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每“携资来滇开采”分不开。

流动的人口群体还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跟随移民的前进脚步，内地的行政制度、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也在边疆地区传播。不同的地区文化相互接触、碰撞、吸收，一方面，移民要学会适应边疆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之；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不同程度地再造边疆的社会面貌。正因如此，从经济开发到文化、社会的进步，成为人口流动推动下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

---

(1)(4)参见郭松义：《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第 13，4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2)《清高宗实录》卷 612，页 20－22。

(3)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载《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 38。